

中国共产党90年来文化政策重心的四次转移

林 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政策重心

[摘要]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以来文化政策的演变,以文化政策重心的转移为标准,将其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建党到建国以革命政治为重心;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整合民众为重心;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则为文化软实力得到彰显的均衡发展重心。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文化的产业属性获得政策的支持与鼓励,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诉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从“文化为生产力服务”到“文化也是生产力”的重大转型,文化政策摆脱了长期以来片面发展单一属性的状况,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新阶段。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955(2012)02-0006-05

考察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来的政策制度建设与变迁,可以有多重视角;其中以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为切入点,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认识的历时性变化,而且可以借此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道路,从而对当下文化政策与体制的改革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政策”概念是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念、在具体政治社会实践中呈现的文化制度建设以及晚近以来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等范畴在内的政策集合;此三者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及其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的认识,是其前期政治斗争与其后执政智慧的体现。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发展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重心经过了由外到内的革命政治指向、整合民众的阶级斗争指向、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和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均衡指向四次转移;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也经过了从“文化为生产力服务”到“文化也是生产力”的重大转型。

一、由外到内的革命政治指向(1921-1949)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论争之中,共产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传入中国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文化就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核心。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文化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22-1923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上海大学,为其文化主张、观念的彰显提供了教育与学术的平台。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念基本以经典马列主义为核心,表现在诸如“反对复古派的斗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文化界的一系列思想动荡之中。寓政治主张于文化论战,以外向的、斗争的意识形态姿态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其实践表现为“通过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倾向革命的著名人士去影响文化界,使文化运动朝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发展”。

[收稿日期] 2011-11-28

[作者简介] 林玮(1985-),男,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法学双学士,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传播与文化产业。

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此时,其文化主张便具有了转化为文化政策的政治与物理空间。作为武装割据政权,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的意义开始具有向内转的特征,即营造一个不同于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格局,或称“苏维埃世界”。这便是毛泽东所言“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以此异质于国统区的文化氛围,来展现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开始从外向的斗争属性转向了内向的建设属性:文化发挥的不再是论战功能,而是凝聚人心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教育上。1928年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就规定,区级以上苏维埃设立文化委员会。《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要求设立“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文化上“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报室、科学讲座、电影、新剧等)”。1931年,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地区各省先后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文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建设功能如此重要,以至于军队也必须分担相应的文化任务。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征集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词”,“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

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向内转还表现在其社会动员功能上。1941年,中宣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之。”这种文化上的“鼓动”,既可实现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思想统一,又能鼓舞其一致对外,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奠定了群众基础。

进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对内凝聚士气和民众信心,对外抗击侵略、批判国民政府,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均衡的双重指向。在这一文化政策的拟定思路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出版发行的报纸近千种,创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抗战建国学院,以速成办法培养了一批文化干部。但随着抗战进入反攻阶段,

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便转入侧重内在整合的文化建国准备,所办大学也以铁路学院、医科大学、建设大学等专业院校为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唯一指导思想——1943年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明确提出以毛泽东讲话作为政策的“基本方针”。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乱环境中,这一时期文化政策的重心虽具由外向内的偏移,但它被视为“文武”两条战线之一,实质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甚至有学者认为“《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而这也构成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语境。

二、整合民众的阶级斗争指向(1950-1978)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延续上一时期对文化内部凝聚功能的基本认识和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内向性特征。文化政策首先强调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作为“国家资源”,被整合进“国家单位”之中。应该说,这与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运动方向是一致的。

在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上,代表傅钟批判了“强调组织领导,会限制文艺的发展”的看法,认为“惟其领导集中,思想一致,组织力强,才是文艺工作发展的优越条件”。这种观念在政界与文化界占据主流,使得文化政策开始趋向不同阶层间在思想认识上达到统一的整合。萧潜回忆“那时期的报刊经常可以看到学术界文艺界非党人士的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寻找在感情上同工农兵的差距,反省过去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同时歌颂斯大林、歌颂苏联、歌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说明文化政策的内向整合功能,在“文化人”内部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还通过文化批判运动表现出来,开国七年文化领域的三大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胡风反革命集团)无不是在思想上整合、矫正异质的努力。

不过,建国三十年间文化政策的整合并不限于“文化人”层面,而是以全体社会民众为对象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革命。它不是文化政策自身变革的产物,而与社会制度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文化为什么要以异己的“生产建设”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对此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解释:国内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落后的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去解决矛盾。分析“八大”的论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其时已经认识到“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在其政策解释中却与是“经济”上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以后者为核心地被笼统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生产力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于是,解决文化矛盾的希望被寄托在了“生产力”的提高上。

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中,这种以文化为异己目的服务的工具论与民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整体上以政治整合为指向,而又不乏活泼氛围的文化政策。例如党中央大力支持《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的改版,要求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个方面,将其变为“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文化界人士的自我改造,大部分也是自觉自愿的。然而,这种生产力与民主理念并举的文化政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贯彻,“阶级斗争”很快取代了发展生产和发扬民主两大任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新的“历史使命”。

1957年,《人民日报》因未报道最高国务会议,而被指为“死人办报”,“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文汇报》也被认为“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以此为标志,“文化”作为党的喉舌、传声筒的政策话语基本形成,并在各政治运动中充当“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工具”。传媒的公信力、

文艺的感染力均逐渐丧失。单一的文化属性片面发展,也对“文化”肌体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56年我国有报纸1236种,1965年有报纸343种,而1968年仅为42种。“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致敬电”等甚至成为地方党组织潜在的“文化政策”。

三、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指向(1979-1992)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了文化政策的指向,将其从“阶级斗争”中摆脱出来。1980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在后文革语境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尽管其未能彻底消除“文化”作为某种工具的“服务论”色彩,但已突显了文化的价值。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作为一个长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的认可。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文化建设”做出界定,其所指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人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注意,“文化”在此时仍是某种“条件”而非目的本身。十三大(1987年)报告则指出:要“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此时,“文化”价值上升到实现目的(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中的“首要位置”。

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围绕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意识形态上的“维稳”,邓小平曾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其二是信息上的流通、传播与教育作用,如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等。在文化功能的两种表现形式中,文化的价值得到了相对独立的体现。在这一时期,《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获得较高评价即可说明“经济建设”的中心作用对文化运行的重要影响。文化的价值在为“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得到逐渐体现。

作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文化政策的政治指向依

然存在。例如中国共产党指示,“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此外,就新闻制度而言,新的“喉舌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取代了“党的喉舌”观,将党的意志与人民的心声在政策导向上摆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政策具有影响其他社会意识的重要价值。

然而,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指向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重心转移的根本标志还不在于文化为经济服务的价值得到挖掘——这其实是传统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观念的“旧瓶新酒”而已。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重心真正重要的转移乃是发现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尽管这种发现并不那么自觉。经营性文化事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考量指标。从“以文补文”到“文化生产经营活动”,1983年开始的文化事业单位试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体制改革为文化的市场价值的彰显拉开了序幕。不过这仅是序曲,直到1992年文化产业正式进入文化政策层面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重心都侧重于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服务,亦即是将其所具有的鼓舞、感染、宣传功能应用于书写时代的叙事,而其自身创造经济价值、突出产业属性的重大变化还有待于新的重心转移。

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均衡指向(1993至今)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问题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一场有关人文精神失落于经济浪潮之中的大讨论轰轰烈烈;而正是在这场讨论之中、之后,“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与市场“共谋”的境地。因此,有学者认为,“所谓‘市场化’不是一般地对市场的赞同,而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运行法则纳入到市场的轨道,因而市场化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而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范畴。”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角度看,这句话在今天是一定程度上应验了的。

从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开始,“文化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就彻底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决策。而此前(1993-2000年间),以政府名义颁布的诸多“文化经济”、“文化市场”管理办法,以及关于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支持,都可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表现。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上,一方面文化政策明确区分为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两种类型,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文化”自身的柔性功能,提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由此,文化作为一种与经济产业价值相挂钩的柔性能力得到了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在这样一种文化政策的引导之下,“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谓空前。这既有社会整体转型时期,问题多发,而“信息来源纷乱众多,没有民众公认的‘权威发布’”的原因;也可现出文化自身精神价值与产业属性得到双重彰显的功效,还包括新媒体等传播渠道在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影响等等。相应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也出现了“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要求。换言之,经过了文化自身独立价值的重新发现和产业属性的开发,“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层面已经具有了对内整合不同社会阶层、凝聚社会共识和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在把“文化”作为产业形态提出之时,即已认识到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吸收外来文化成果以丰富自身的重要性。2000年文化部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就提出“鼓励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又一次提出“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此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和“若干政策”等,接连出台。这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具有对外吸引世界关注力度、引入先进文明成果、开发国际文化市场的作用。借用王一川教授的归纳,“文

化”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形态中构成了“对内凝聚”和“对外吸引”两种功能,简称“内凝外吸”,这正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重心向软实力指向转移。

这一指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现,始终朝着同一方向发展,每年都有若干文化政策出台,以协调其产业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平衡,主要形式则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出口。尤其在2009《文化产业振兴纲要》出台以后,相应的文化政策密集发布,构成了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重心在中国社会框架中的位置:文化已经不再是为“生产力”或“经济建设”服务的了,相反,它已经成为新兴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形态之一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成为一时宣传的重要口号。

这一状况的出现,除了文化政策自身演进的轨迹和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之外,还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语境的原因。前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能力建设意识的充分觉醒,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执政姿态使之成为与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相比列的合目的之一。而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文化”乃是作为一种与国民精神、幸福感、文化素养等相关联,并可创造物质财富、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独立范畴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的。后者则与中国思想界的演变状况关系密切。自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左右之争不断从文化领域投射到政治领域,或由作为权力场的“政治场”向“文化场”施压。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进入体制而被“学院化”了之后,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学界对此现象有不同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被政治收编的同时,也增强了执政党的文化建设。例如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的讲话中使用了诸如“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主动设置议题”、“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等等,无不说明学术已经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进入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制定思路之中。

在“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核心之时,文化的精神与经济、对内与对外双重属性在文化政策层面均得到了体现,从而使文化政策呈现出一种软实力色彩,并具有均衡发展的指向。值

得说明的是,2010年文化产业学界指出要警惕文化产业的唯GDP化,即是一种均衡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学术界与执政党在文化产业领域形成的合力:均衡发展的文化政策既有利于文化独立性的发挥,又能够兼顾文化的产业属性及大众的文化需求,是符合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状况的。

概而言之,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重心发生了一条有迹可循的转移轨迹。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身份认同在文化上的反映,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属性认识的变化与深入,是其执政能力提升的体现。历史证明,执政党在制定文化政策的过程中,让文化自身多重属性得到充分、均衡的发展,则有利于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文化软实力;而片面强调文化的单一属性,则不仅造成文化的损害,还有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十二五”期间,国家文化建设的政策制定方面仍面临着从计划向市场、从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双轨发展的体制变革任务,这是一项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的文化政治创新。而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实践效果与预期间尚有较大差距,诸如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展文化的精神价值属性,如何突出事业与产业并重的政策重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保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充分发挥等,都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新的路向。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C].人民出版社,1991.
- [2]邓小平文选[C].人民出版社,1983.
-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C].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5]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C].新华出版社,1980.
- [6]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7]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C].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8]丁柏铨等.执政党与大众传媒[C].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9]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周建瑜)